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五卅运动”中厦门人民的反帝怒潮

第六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五月

“五卅运动”中厦门人民的反帝怒潮

市政协文史编委会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开枪镇压中国工人的罢工运动，当场打死打伤中国工人顾正红等十多人。事件发生后，上海各大学学生走上街头，为死伤的工人进行募捐。租界巡捕逮捕了好几个正在进行募捐的学生，并且非常嚣张地宣布：将于5月30日在会审公堂开审这些被捕的学生。5月30日这一天，上海各校学生两千多人为了抗议帝国主义无理杀害工人和拘捕学生，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又被英国巡捕逮捕了好几百人。许多群众看到巡捕的凶悍，深为不满，人越集越多，汇成了一股巨流。到了下午一点钟，一万多群众就在南京路上举行反帝大示威，英国巡捕竟然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开枪扫射，当场被杀害的有四人，因伤重死在医院里的七人，受重伤的八人，轻伤的无数。这就是震动世界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厦门人民从报上看到“五卅惨案”的消息，群情愤慨，也很快地投入这个火热的斗争。

一、厦大学生 首先响应

在厦门，首先起来响应“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是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厦门大学学生。6月2日，厦大学生会总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以厦大学生会的名义：（一）电上海学生会慰问，并表示誓为后盾；（二）电上海民国日报

转全国各社团，一致声讨帝国主义暴行；（三）电北京段执政，要求政府严重交涉，以保主权而维国体；（四）征收临时捐，每人小洋二角。

为了进一步发动全体同学共同参加反帝爱国运动，6月4日，厦大学生会推选罗扬才（他是厦门最早第一批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五卅运动”后两个月到广州参加全国学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入党的）等12人负责进行援助“五卅惨案”和组织厦门学生联合会事宜，并通过“五日上午八时集队到厦门市区示威游行”等决议。

6月5日上午8时，厦大学生开始罢课，集队到市区游行，并分成数队在街头进行演讲，散发反帝传单和“为五卅惨案罢课宣言”，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买办军阀卖国求荣的种种罪行。罢课的当天晚上，厦大学生会又举行了一次临时大会，一致通过组织“厦门大学学生外交后援会”，选举罗扬才等10人为筹备员。6月6日，厦门大学全体学生又参加各界联合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7日上午，厦门大学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邀请上海特派莅厦代表报告“五卅惨案”经过，全体同学更加激起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厦门大学学生外交后援会”是7日正式宣告成立的，自此以后，厦大学生走出课堂，积极开展反帝宣传和进行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厦大学生后援会”编辑部还出版《声援周刊》，刊载“五卅惨案”的真象，发表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文章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种种罪行。在《声援周刊》的“发刊短语”中，明确地提出反对“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者”，“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撤消领事裁判权”等革命口号。

厦门大学的教职员30多人也于10日下午开会，讨论组织

“厦大教职员外交后援会”。这次会议，虽然没有组成“厦大教职员外交后援会”，但却通过了发表宣言和募款汇往上海救济工人等决议。

由罗扬才烈士领导的“厦大学生外交后援会”演讲部，组织了好几个演讲队，不断把宣传区域扩大到禾山各乡和公共地界的鼓浪屿去。旧历端午节（6月25日）上午8时，演讲队到鼓浪屿，备受鼓浪屿人民的欢迎，有一个商人听了演讲，深受感动，当场对听众控诉他亲眼看到的帝国主义对南洋各属华侨的压迫。

暑假期间，“厦大学生外交后援会”在校中设总部，继续领导反帝爱国运动；又组织内地各属同学回乡，襄助当地各社团进行反帝爱国运动，使反帝斗争的烽火，燃遍乡间市镇。例如“龙溪留外学生联合会”，是由回漳州度暑假的厦大学生发起组织的；海澄县港尾镇的“外交后援会”，是在前往该地宣传的厦大学生协助下成立的。

二、“三罢”斗争和“国民外交后援会”的成立

正当厦门人民掀起反帝浪潮的时候，一艘日本轮船“凤山丸”从台湾开进厦门港来了。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厦门工人阶级，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积极地投入了火热的斗争。码头工人、落海工人、双桨工人，一致拒绝为“凤山丸”起卸货物。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海员，也离开了他们的岗位。还有洋务华员、邮政工人以及造船厂的工人共六百六十多人，同时宣布罢工。许多外国人雇佣的杂工、厨师、保姆，也激于爱国热情，卷起铺盖，宁愿忍受失业的痛苦，不愿继续为外国人干活。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坚决行动，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和推动各阶层人民的爱国运动。

在厦门工人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带动下，厦门各

中、小学的爱国学生也行动起来了。6月初，省立十三中学、厦南女校、中华中学、同文书院、大同小学、蒙泉小学……等许多院校的青年学生，先后举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集会，宣布罢课，并组织宣传队、募捐队，走上街头，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和捐款活动。集美学校的学生，联合教职员工，组织救国团，成立宣传队、纠察队，并认捐3600元，汇往上海接济罢工工人。集美学校的宣传队，曾到同安各地乡间宣传演讲，纠察队队员，不辞辛苦地在码头检查英货、日货。

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影响和推动下，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罢市的决议。除了海后滩的洋行和局口、思明南路一带的日籍浪人开设的商店外，全市无论大街小巷，商店一律关门。

还有思明教育会、通俗教育社、益同人公会、各保保民自治会等群众团体，也纷纷集会谴责帝国主义的兽行和表示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

在通俗教育社的集会上，有人提议联络厦门各社团、各学校组织“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以便统一领导厦门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这个建议，符合当时人民群众反帝斗争形势的要求，得到许多社团的赞成。6月4日，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当时临时省党部设在厦门，是1924年由周恩来同志派江董琴从广州来厦门组织的）召集了思明县教育会、商会、通俗教育社、益同人公会、华侨协会、建筑工会和各保保民自治会等30多个群众团体以及厦门大学、各中、小学的代表近百人，在岛美路头商会开会，推选江董琴、庄希泉等25人为委员，成立“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并决定6月6日发动一次各界人民联合示威大游行。

三、反帝怒潮 汹涌澎湃

6月6日清晨，各群众团体和大、中、小学的示威游行队伍分头出发，前往演武场（今厦门大学）集合。参加示威大游行的，有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邮政工会、洋务华员工会、落海工会、驳船工会、双桨工会、搬运工会、建筑工会、教育会、通俗教育社、商会暨各同业公会、益同人公会、华侨协会、各保民自治会、厦门大学、省立十三中学、中华中学、大同中学、女子公学、厦南女学、同文书院、双十学校、桃源小学、紫阳小学、玉紫小学、蒙泉小学、吉祥小学、鸿麓小学等90多个机关、团体、学校，人数达二万多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超过1919年“五四运动”的示威游行队伍。参加游行的人们，手执写着反帝标语的小旗，情绪非常激昂。

示威大游行出发以前，先举行“厦门各界人民声援五卅惨案大会”。大会由江董琴、余佩皋（厦南女学校长，庄希泉同志的爱人）等人主持。在大会上演讲的，有厦门大学学生代表罗扬才、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代表许卓然、教育会会长黄幼垣等人。将近九时，示威大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市区挺进。各工会抽调优秀的工人组成了纠察队，胸前佩着银质的纠察队章，拿着木槌，和各中学童子军组成的纠察队，共同负责维持游行队伍的秩序。

当游行队伍进入被英帝国主义强占的海后滩租地时，“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死难同胞复仇！”“实行经济绝交！”“收回海后滩租界！”的雄壮口号声，响彻云霄。海后滩是各帝国主义洋行的集中地，英帝国主义在这里设立了工部局，雇用20名英国、印度巡捕“维护租界治安”。在平时，普通的厦门人民是不能轻易从这里经过的。但自从“五卅惨案”引起全国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帝

爱国运动以后，帝国主义在觉醒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了。示威大游行队伍还未进入海后滩之前，英、日帝国主义驻厦门的领事许立德、井上庚二郎，就和当时执掌统治厦门军政大权的海军军阀、漳厦海军警备司令部司令林国庚勾结起来，由林国庚派出军警在日本帝国主义开设的台湾银行（今海后路人民银行）、三井洋行（今海后路商检站对面）和英帝国主义的太古洋行（今海后路粮食局仓库）等处屋顶架上机关枪，保护帝国主义分子的安全。游行队伍走到这里，目睹反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卖国丑行，个个怒不可遏。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地上捡起一切能够投掷的东西，把台湾银行、三井洋行和太古洋行的玻璃窗户搞得稀烂。反动军警看到愤怒的群众情绪极端激昂，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动弹，帝国主义分子更不知躲到那里去了。这一壮举，显示了厦门人民无比强大的威力，打下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并为后来的收回海后滩英国租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这次示威大游行中，鼓浪屿英帝国主义办的英华书院和美帝国主义办的美华书院，居然在这一天禁止学生参加游行。这两个学校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在下令学生不得参加游行的同时，还关上学校大门，组织人员巡视监督。尽管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平时受到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影响，然而在全国人民反帝斗争浪潮面前，激于爱国义愤，也能够不顾学校当局的百般阻挠，冲开大门，胜利地渡海参加示威大游行，表现出爱国青年学生英勇不屈的气概。

示威大游行以后，厦门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达到了高潮。大街小巷，到处有宣传反帝爱国的队伍。各群众团体和各中小学还联合在南田仔墘中华戏园举行过一次宣传演讲大会。通俗教育社又先后在中华戏园和鼓浪屿鹭江戏园演出以

“五卅惨案”为题材的话剧；出版了以反帝爱国为中心内容的《通俗周刊》和《通俗丛刊》。

6月18日，高擎反帝斗争旗帜的“厦门学生联合会”诞生了，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对上海五卅惨案宣言”。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军队在广州沙面开枪屠杀广州示威游行队伍的消息传来，学生联合会除电慰沙基受难同胞外，并于6月25日上午组织全市青年学生前往鼓浪屿公共地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学生队伍先后在工部局、海关港务长住宅（今河仔下鼓浪屿医院分院附近）和英国领事馆（今鼓浪屿轮渡码头附近）等处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继之又在大宫口“洋人球埔”（今人民体育场）、河仔墘、龙头街等处进行街头演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直到下午二时半，才整队回归厦门。

“五卅运动”开始的时候，厦门人民就已自觉地拒买日货、英货。示威游行以后，“国民外交后援会”即派出调查组和纠察组专门执行抵制英货、日货的工作。凡运动前各商号所存的英货、日货，一律登记封存，禁止出卖。“外交后援会”依靠各商号的店员工人，监督奸商破坏抵制英货、日货运动。当时经营洋货的，如布商“锦云章”（店东陈泮老）、“怡美行”（店东吉仔），杂货商“福隆庆行”（店东杨仔时）等，就曾经受过“外交后援会”的警告和处罚。这个期间，抵制英货、日货运动，开展得相当深入，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四、帝国主义勾结军阀政府破坏爱国运动

与全国各地一样，“五卅运动”期间厦门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曾经遭受到帝国主义和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军阀的阻挠、破坏。工人罢工开始以后，日本、英国、美国等帝国

主义不但借口保护侨民，连日开入数艘军舰示威，他们还勾结反动军阀林国庚，下令禁止工人罢工，并由反动警察厅长杨遂派出大批军警，强迫罢工的工人复工。日本帝国主义甚至指使由它的走狗日籍浪人头子林滚、李良溪等组织的“自卫团”，以武力对付执行抵制日货的调查员、纠察员。反动军阀的警察厅也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命令“外交后援会”停止抵制英货、日货的活动。商人的罢市，同样在林国庚派出大批警探的威胁下复业。

帝国主义的武装威吓和反动军阀的阻挠破坏，并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镇压下去。相反地，在“沙基惨案”发生之后，厦门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这一来，可把帝国主义急坏和把军阀政府气坏了。当时，英帝国主义驻厦门领事许立德，是个居住中国四十多年的“中国通”，说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这个家伙还是帝国主义在厦门的领事团的领袖领事，外表装得很“斯文”，骨子里却非常阴险。他看到硬的不行，就改变策略，采取麻痹、迷惑、收买、利诱、拉拢、分化的办法对付厦门人民。

帝国主义破坏厦门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具体做法，第一步是派遣买办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厦门外交后援会”，从中挑拨离间，进行破坏活动，分化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把他们拉出运动之外。

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是个群众性的反帝爱国团体，阶级成分相当复杂。帝国主义利用这一点，派遣了他们的走狗混了进去。混进外交后援会的帝国主义走狗，有以林仲馥、王宗仁为首的英美派系买办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以曾厚坤、吴蕴甫为首的日籍高等浪民。林仲馥当时的社会职业是“思明日报”社长兼主笔（这个报是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合

资创办的)、美华书院校长和兴兴公司的经理;王宗仁的公开职务是厦门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曾厚坤担任过好几年的“台湾公会”会长;吴蕴甫担任过好几年的“台湾公会”议员,都是凭借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非法经营鸦片买卖的大老板,也是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以群众团体代表的身分或以商会代表的名义混进了反帝爱国团体后,秉承帝国主义的指示,在外交后援会中掀起一股逆流,企图从内部搞垮厦门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破坏厦门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二个步骤,是在厦门人民汹涌的反帝怒潮面前被迫采取一些表面上“让步”的措施。原来厦门人民从1918年以来,就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收回海后滩英国租地的斗争。“五卅运动”期间,收回海后滩的口号提得更响,反英浪潮的激烈,更是空前未有。为了缓和厦门人民的反帝斗争,狡猾得象狐狸一样的许立德,在6月1日照会林国赓和交涉员刘光谦,“主动”提出撤消租地巡捕,请求中国政府派警进驻。厦门人民在运动中提出修改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的战斗口号,许立德以“领袖领事”的身份表示可以增加华董,从原来的三名华董增加三名来满足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欲望。6月25日,当厦大学生宣传队和厦门学生联合会的宣传队赴鼓浪屿示威游行之前,许立德又以“领袖领事”的身份通知林国赓派中国警察到鼓浪屿代替巡捕站岗,而把原来工部局的巡捕从岗位撤回工部局里。直到下午三时,林国赓派到鼓浪屿的中国警察才随着示威游行队伍离开鼓浪屿,再由工部局巡捕接替中国警察。许立德这种做法,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把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交给反动军阀林国赓,不怕林国赓不妥善保护,比他们自己的几十名巡捕来得更安稳;另一个是,有意使人

感觉到厦门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和善”的，并不像上海、广州等地的帝国主义那么凶狠残暴，借以缓和厦门人民的反帝斗争情绪。它们派进外交后援会的走狗，更以这些“让步”措施为根据，做为美化帝国主义、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本钱。

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初期，正值厦门人民反帝高潮之际，那些帝国主义的走狗慑于群众的壮大声势，只能潜伏下来，暗中进行破坏活动。但在帝国主义被迫做了点滴“让步”以后，他们就逐渐抛头露面，密切配合。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也越来越表面化了。在六月下旬一次讨论支援罢工问题的会议上，林仲馥等人竟公然提出反对罢工的主张，说什么“罢工会引起英、日军舰派兵登陆，政府当局也是不能允许的。万一发生惨案，商人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又说什么“英国领事已把海后滩的警权交出，并答应修改鼓浪屿租地章程，增加华董；学生到鼓浪屿示威游行宣传，工部局还把巡捕撤回，一再向我们退让”等一大套鬼话，煽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威胁主张坚决反帝的人，彻底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面目。

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就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有着动摇、妥协的一面。商会副主席蔡雨村，糖油公会主席黄瑞甫，珠宝公会主席吕天宝等，经不起走狗派的威胁，又考虑到罢工要掏他们的腰包，还怕影响他们的买卖，在关键性的时刻，也不反帝了。这正中帝国主义挑拨离间之计。另一部分人被英国领事许立德的“让步”假象所迷惑，相信帝国主义有凶恶和“善良”之别，不愿意搞得“过火”；又有少数人被收买。就这样，附和不要罢工的人占了多数，厦门的罢工运动没能再搞起来。后来，连抵制英货、日货运动也有了

变通办法，并于7月11日索性宣布取消。

五、扑不灭的火焰

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武力恫吓也罢，挑拨离间、收买利诱也罢，只能使反帝爱国运动受到暂时的挫折，而永远也扑不灭反帝斗争的火焰。

在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通过不罢工决议的那次会议上，江董琴、庄希泉等15人当场退席，表示不合作；越日，便登报声明退出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七月初，一个新的反帝爱国运动领导机构——厦门外交协会，又再宣告诞生了。

厦门外交协会以援助“五卅惨案”，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宗旨。会址设在岛美路头（今中山路）“中国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共有执行委员江董琴、余佩皋、李觉民（厦门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等21人。7月25日，厦门外交协会发表了具有纲领性的宣言。从此，担负起新的战斗任务，领导了厦门人民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派兰裕叶同志到厦门吸收了罗扬才、李觉民、丘泮林等10多人为共青团员，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同年秋天，罗扬才、李觉民同志代表厦门学生联合会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学联第八届代表大会，就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中国共产党派他们回到厦门进行建党工作，先后发展了柯子鸿等20多人入党，成立了厦门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厦门国民党地方组织进行整顿和改组，于1926年2月在厦门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并领导的国民党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26年11月，由中国共产党人罗扬才、杨世宁等同志领导的厦门总工会也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厦门人民组织了新的反帝斗争机构——厦门反帝大同盟。此后，厦门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前項亦宜封家日且民丁干托

敵火砲災不特 正

漢神 同商對將 回忆王亚南校长

出近水而 刊登的佈置既受保護國受帝又費諸只

一林其象一 敵火砲中半

。土斯会大張的寫大工罷不拉面会餐司交代英國

近年来，厦大同志常说“我们更加怀念王亚南校长”。对于跟随他学习、工作多年的我，这种体会尤其深刻。下面我想写几段亲眼所见到的、亲耳所听到的事，以作为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一、从我当他秘书回忆起

1960年初，王亚南同志学术活动频繁，这方面的事务工作不少。他向校党委提出，最好能有个人帮助他整理资料，誊写文稿。校党委同意他的要求，研究后让我当他的学术秘书。但这件事并没有立即通知我，大概要先让他自己试着。

2月间，科学院福建省分院成立，王亚南同志任分院院长。他到福州参加成立大会时带我当记录。这大体是一次试用。开会前一天，在西湖宾馆里，他一边擦皮鞋，一边口授发言稿，叫我尽快整理出来。当他把我整理的稿子看了之后，点点头，笑笑。会议期间，有一天晚饭后休息时，他要我陪他去西湖散步。在垂柳树荫下，他边向我交代工作，边同我闲谈，问我的家庭、年龄、爱好，还问到有爱人没有……。我小心翼翼地但是认真地逐一回答了。我象是在老师面前考试的学生，开头有点紧张。王校长静静地听着，有时也插一两句，有时哈哈大笑。给他一笑，我倒感到轻松了。以前我只是在全校会上听他报告，现在直接同他交谈，而且只有我

同他两个，这，我怎能忘记？

会后不久，王校长又出差了。他没带我去。3月25日，他临走时留了一封信给我：“……请你第一步就《资本论索引》中有关‘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生产能力’那一项，从原书中摘抄出来，写得清楚一点，便于参考。其他方面有此类说明的，也可搜集一下。记得1950—51年《学习》杂志曾讨论过，找得到，也把论点搜集一下。”任务不但明确而且具体。4月，他回到学校，即通知我搬到他那座楼同他一起住。从那时起到他去世近十年中，我一直一边跟他学习，一边帮他处理一些学术方面的事务。在学习、工作过程中，他是我难得的老师和直接的首长。

二、校长抓紧教学亲自任课

在我的记忆里，王亚南校长十分重视学校中的教学工作。他常说：在学校里“不搞教学，不好好读书，那国家还要花那么多钱办大学干嘛？”他不但亲自抓学校各系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抓教学工作的检查和总结，而且亲自参加教学活动。

1960年夏天，经济系领导向他请示有关《政治经济学说史》这门课的上课问题。王校长以为系里开这门课有什么困难，便对他们说，自己要来上这门课，可以列入下学期教学计划中去。经济系领导同志倒有点过意不去。但王校长则说：“教书嘛，我是个‘老农’啊！我年轻时每天要走几十里路去教书，现在在校内上课怎么不行？”

上课事定下来后，王校长即着手进行上课前的各种准备工作，找参考资料，编写讲授提纲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在工作繁忙、经常开会的情况下，还编印了六万多字的讲稿提纲发给同学。

对于上课，王校长十分重视。是年暑期，他去青岛开会，会后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其间他不忘学校工作，尤其不忘自己要上课的事。8月2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我，叫我“去了解一下，经济系的《经济学说史》那门课，下半年开不开，如开，你可找一本有关的书学习学习，以便听课时胜任做笔记。……”

开学时，《经济学说史》按时开课了，每周上两次共四节课。王校长对自己课非常重视非常认真。即使出差离校，他也总把它挂在心上。1960年10月间，他出差福州，原计划三五天便回校，后因有事延期了，为此，他颇不安，即叫我写信给经济系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黄志贤同志，请他通知同学们，对所上的课程先进行预习，他回校后可讲得快一些。年底他又出差北京（我没跟去），回头时顺便在上海检查一下身体。12月5日在上海写了一封信给我：“……在开会期间，脑子不大清爽，主要是气候关系。……大概没有什么需要治疗的病，检查一下就回来。”“你把已写好的学说史讲义印好，要同学先温习一下。”

王校长对自己上的课是这样认真，对同学的学习是这样的重视，怎不令人感动？给一般同学上课是这样的，对自己担任培养研究生的课，更是可想而知，他就是如此花费自己的心血的。

三、对学生严格要求，耐心教育

王亚南校长一向认为，“学生到学校来，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而学校的工作“要把他们培养成国家合格的建设人才。”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国家建设人才，他主张对学生要严格要求，那不仅在学习方面，而且在思想和生活等各个方面。

王校长对学生学习上的严格要求，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做到认真学习，避免出废品。这是厦大师生都知道的。这里我要提到的是对学生思想和生活作风以及文明礼貌方面的严格要求。记得1965年上半年一次傍晚，他自己一个人到学生宿舍走了一圈，回到家里有点发火地说：“有些学生太不象话了，我到他的宿舍，连理也不理我，有的还把脚翘在桌上，象什么话！”我说：“您平时不在学校，他们多不认得您是校长。”他火气更大了，说：“那跟这些有什么关系？不用说我是校长，就算是那里来的老人吧，你也该让位，客气些，这是最起码的礼貌问题！”为此，他要有有关单位加强对学生进行作风方面的教育。

有人说王校长对学生生活作风方面要求严格，可不会做思想工作，这话毫无根据。事实是，王校长不但做思想工作，而且做得很细致。那就是循循善诱，耐心教育。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即够了。1960年下半年，某系三年级有位侨生连写两封信给他，要休学出国。王校长抽空同那位侨生谈了两三次话，有批评也有鼓励，要他克服困难坚持学习。他担心光谈话不一定解决问题，11月12日，他特地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那位侨生，信上说：“人是难得从麻痹鬼混的思想状态中觉醒的，一有所觉悟，要再满不在乎地麻痹鬼混下去，也不一定很容易。”“我之所以要在百忙中，反复同你讲这些话，因为第一，我体会，你目前感到的困难，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你的思想状态造成的；第二，你还可造就，还有回头是岸的可能；第三，你是从海外回来的，我们更有责任帮助你。”“你接到这封信，再从长考虑一两天，如觉得还是离开好，就由系里帮你办休学手续，把你要去的地址告诉系里。因为你走后，学校有责任对你家庭负责，不知道你去到